

六科村·桃花源·求志社

宋维远

六科村是湖岭镇西北面一个四五十户聚居的山村。这里群山环抱,溪流围绕,草木丰茂,翠绿葱茏,古代曾是野鹿群栖、繁衍生息的福地,故村名“鹿窠”;又因为有六条溪水汇聚村边,当地人取鹿窠二字的谐音雅称“六科”。



六科成求志社员的桃源

六科村虽然没有“夹岸数百步”的桃花林,但诱人的景色,宁静、淳朴的环境,却深深吸引着清同治、光绪间瑞安城里一班为探求强国富民道路,结成“求志社”的青年知识分子们的眼球,他们把六科村看作自己心中的桃源。不过,求志社员认定的桃源与我国晋代陶渊明笔下用作躲避乱世的桃花源却大不相同。求志社员陈虬写的《求志社记》中说:“吾友许子拙学(启畴),负经世材,久不得志,尝欲率同志入山举……”取“隐居求志”的意义,想找个“可耕可樵、可仕可止”的山村隐居,以之“修明绝学,供世驰驱”。可见,他们的隐居是为了讲学、出仕,以追求救国学问,听候祖国召唤,以为国出力为己任。

于是,求志社员把隐居讲学的理想处所选择在六科村。他们曾议定:20多户人

家,每家出资五百钱,买地三顷,在六科建房聚居在一起。房屋有讲堂,有社员们的住宅,有书塾、有藏书室、有仓库;还辟田畴、修溪塘、植树种瓜果,还有妇女手工劳动场地,设专人购买生活必需品,各家搭买公派。讲学时,每人发挥自己天文、地理、文章、历史、掌故、算术、医学、书画、篆刻、骑射等专长,互相传授、切磋,教育子弟,社员和睦相处,自由谈论国事。特别约定在社内都要穿布衣,以表示平民化,但外出赴考、做官、游学可穿随俗衣服。在求志社大门外,专辟一所小屋,作为更衣之需。

求志社员中大部分是心兰书社社员,还有一些未入社的同情者。他们互帮互学,学问进步很快。从心兰书社建立的同治十一年(1872)、求志社成立的光绪七年(1881)起,

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二三十年中,社员中就有6人蝉联5科举人,其中2人又中进士。同期中,瑞安县中举28人,进士10人,居温州各县之首。宋恕说:“其后瑞人才所出,苟非治善祠塾(孙衣言办),则必求志社,求志社名闻天下。”

由于求志社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创造了一个探索救国真理较为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他们都怀着关心祖国前途、命运的责任感,敢于大胆议论国家大事。这本身就是对当时清廷黑暗统治的一种抗议与否定,在社会中产生一定反响。与数十年后以康有为、梁启超首倡的维新变法运动相呼应,在瑞安县城中,涌现了以陈虬、宋恕(求志社同情者)、陈黼宸“温州维新三先生”为代表,鼓吹维新的知识分子群体,还在中国近代史册中留下了一页浓墨。

求志社为时势所难容

可惜,中国19世纪末期的时势,对地处海隅的瑞安爱国知识分子团体也不肯宽容。求志社员们只活动了短短七八年时间,便横遭厄运的摧残、打击:一是求志社这种隐隐有结党倾向的活动,引起乡人中保守者的纷纷非议,还认为他们是“妖”,准备向官府控告,称他们是“布衣党”。“幸得当时一二耆老”出于爱惜人才的考虑,多方

掩护,才没有酿成大祸。但求志社的影响竟传播到京师。陈虬说:“庚寅(1890年)北上(京师),座师太史陈公(鼎)首相诘问,盖都下亦皆知有东瓯布衣矣!归自京师,忌者尤众,虬恐踵明李诸社之祸”,即主动釜底抽薪。二是牵头的许启畴出游江淮,郁郁无所遇,于1886年去世。其他社员或外出谋生,或去当教师,办报纸,各自星散。陈

虬、池志激等人所办的利济医学堂、医院又受到政治、经济的双重压力,陈虬亦因贫病交迫而逝世。求志社便销声匿迹了。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新闻界巨擘赵超构(文成人,原属瑞安)的稿件涉及当时政治第三点时,他的好友仍以“东瓯布衣”来规劝他;而别有用心的人还把“东瓯布衣”的旧账算到他头上呢!

求志社拉近六科与瑞城的距离

六科村离瑞安县城约有70里的路程,清末交通不便,在六科人的眼里,瑞安城是个遥远的地方。而农民与书生

们往往不相往来,思想更有隔阂。但是当求志社员们看中六科这块好地方后,两下距离也就拉近了许多。

至于求志社员们究竟有没有到六科村去实现他们的理想,由于史料缺乏,至今难做定论。但他们当中的主事者们来到六科,并着手筹备他们的“桃源”,应是不争事实。如此说来,六科这个宁静的小山村也就被求志社推向了瑞安近代史的旋涡中去,更为六科村的山川增添了亮点。我想,六科村的父老们或许应该肩负起:寻觅求志社员的遗踪,并刻下历史的印记,以激励乡里后人这个光荣责任吧!

缅怀先人 承继家风

解读先曾祖黼唐公生平事迹

俞海

曾祖父黼唐公,出身贫寒而自强不息,历经磨难而勇于担当;为人刚正俭朴,淡泊名利,勤俭持家,教子有方。一生勤奋著述,其著作《周易讲义》、《禹贡说要》、《存古翼圣篇》和《河间诗存》,作为温州地方文献至今仍被保留在有关部门。

出身贫寒 历经磨难 自强不息

据先祖父春如公的《先考黼唐公行状》介绍,我们塔儿头俞氏曾经“以商起货,为邑富家”,后来家道中落,接着因为改行读书,不从事生产了,所以家更穷了。

第七世黼唐公名君尧,字寿年,是我们的曾祖父。因家庭贫困,从小从事体力劳动。但他志向远大,从不自暴自弃,常在劳作之余,手捧书本,向父亲请教。没几年工夫,聪颖好学的他就读完儒家的“六艺”,而且剖析问题头头是道。十多岁的他居然成为父亲教学的好帮手。后得到胡筱泉赏识,补上学官弟子。这时,他遇到一个走上仕途的好机会。

然而,命运对他十分不公平。家庭突遭变故,在短短5年内,父亲、伯父、母亲、叔叔相继亡故。更为不幸的是,几年后妻子又撒手人寰。接二连三而来的沉重打击,不但使他家贫如洗,而且精神上蒙受巨大打击,在此极端困难情况下,曾祖父以教书谋生,用超常毅力,顽强地挑起家庭重担。因无法专心举业,以至错过科举考试机会。

直到光绪甲辰(1904),已经54岁的他终于得到提拔,被任命为县学教谕。这一年,我们的祖父春如刚好16岁,通过童子试,成为一名庠生(秀才),这使他得到稍稍安慰。五年后,宣统己酉(1909)年,将近花甲的他又陪儿子到杭州参加省试,儿子被选拔为贡生的第三名(拔贡),让他看到家族的希望。

第二年,他兴冲冲带儿子北上参加京试,借机“历览异邦风物”,开阔胸襟,回来以后“闭户撰述”,写出《易经讲义》和《禹贡说要》两部著作,还写了许多诗文杂作。

关心国事 与时俱进 上书内阁

民国以后,年近花甲的他“鉴于天下扰乱”,怀着一颗爱国忧民之心,写了一篇《上内阁书》,提出“守宗旨,正纪纲,罢会议,清本源,维道统,慎法律,肃权限,端规则,厚风俗,收人心”等十点建议,这是他经长期思考后,对国家时政提出的改革主张。这些主张和同时代的孙诒让等瑞安改良派人士的言论,如同出一辙,充满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真知灼见,但因言辞过激,没有被上面采纳。后来,他对别人说:写作的目的在于传世,传世言论必须正大光明,有利于天下,解决老百姓生活上的实际问题,切忌华而不实。只有提倡经学,弘扬中华的固有文明,才能端正人心,消弭战争。

从这些主张和言论中,可见他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文人,而是一位有思想、敢说话、能与时俱进的思想先行者。为在先贤著作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晚年埋头整理古籍,以十年心血,写成《存古翼圣篇》一书,遗憾的是书还没有印好,人就去世了。那一年他已71岁高龄。

刚直宽厚 爱憎分明 持身勤朴

祖父在这篇《先考黼唐公行

状》里,还用较多篇幅记述曾祖父的为人、性格特点和言行教诲。

一、秉性正直,喜欢读书,从无不良嗜好,最看不惯拍马奉承、追逐名利的人。

据《行状》记载:“先考禀性刚介,志虑精纯,不屑阿谀媚世,熙攘逐利。而酒食酬酢,丝竹博弈,凡为世人所嗜好,绝不关心。每于持家课读外,独坐斋中,翻书评点,至惊心动魄处,不禁抗声大呼,有响遏行云之概。居恒不乐标榜,然里中之以学鸣者,有所述造,先考得之必称赏不已,醅醅乎其有味也。”

他的《河间诗存》中有一首题为《丝竹》的七律,可见他的为人和性情。

“我家旧在水衡村,丝竹原非我思存。刻羽商甘独拙,会文对酒爱重论。投艰世事无心累,鸣盛昔情有志元。书读一生浑未了,日西自月到黄昏。”

二、崇尚忠孝节义,遇事爱憎分明,尤其憎恨贪腐之徒。

据《行状》记载:“先考持正,不苟言笑。遇老农民与谈忠孝节义事,娓娓不倦。见有言不轨行不方之徒,虽非相识,而在稠人广坐,亦严斥之无所忌。”

他曾经把社会上的不良风气概括为“四恶”,作诗予以抨击:“趋新世态务繁华,好似飞尘与散沙。试问堕楼人去后,蜡薪犹见石崇家。”

三、孝敬上辈,关爱子女,持家事必躬亲,布衣素食,处之泰然。

据《行状》记载:“先考脑力逾恒,神明老而勿衰,少岁事历历数之如昨日,不爽毫厘。声如洪钟,口多吉语,境虽贫寒,终始不作寒乞态。持身勤朴,布衣素食,处之晏然,事无大小必躬亲而后释然。”又说“笃于孝友,不辞劳瘁”,“抚恤从子,视如己子。”

以上有关记述,说明曾祖父不但在贫寒中能够坚持文人操守,安贫乐道,而且性格刚直,疾恶如仇,孝上爱下,勤劳一生,品德十分高尚。

家规严明 教子有方 勤奋著述

俞春如对他父亲的谆谆教导记忆十分深刻,《行状》里记录了其父对他所说的话:

“汝家传忠厚,从无舞弄地方之事,汝勿挟势弄文,累邦人而坏家法。”挟势弄文,攀附官府,欺压邻里,这是封建文人中常见的陋习,曾祖父对此深恶痛绝,除以身作则外,严格要求儿子传承忠厚睦邻家风,并提高到“家法”的高度,可见教子严明有方。

在俞春如省试折桂拔贡后,曾祖父又对他讲:“为官最易坏人名节,况汝才薄年轻,一人仕途,恐失我清白家风,当此举国汶汶,从事诗书,阐扬圣道,斯为得矣。”为了防止祖父少年得志,被官场的恶俗所侵,不能洁身自好,对此及时提出警诫,敲响警钟,防患于未然。

曾祖父有一首题为《慎行》的诗,被俞春如选录在他的《春如诗话》中:“天下忧患必先,延安锐意世喧传。乃公文正心无愧,有子纯仁志益坚。三世布衣清俭第,两朝宰相恕缘。余生翘首前贤轨,笃行随年敢息肩。”

诗作透露了他的心声,说明他一生遵循“慎于行”的古训,同时,也是对后辈的殷切寄语和期望。

